

影剧院往事

慢时光

虞燕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岛，精神生活相对匮乏，影剧院一出现，自然成了炙手可热的福地。鼎盛期，每天都放电影，有夜场，也有白天场。影剧院外墙及台阶下的某些特定位置，一张张电影海报如花枝招展的姑娘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，赚足了眼球。

《南北少林》《黄河大侠》《海市蜃楼》《黑楼孤魂》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《青蛇》……那些电影像神奇的调味品，竟让一个个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而隽永。到影剧院看电影，从赶时髦变成了一种常态：闲来无事，去看场电影；过节过生日，约上三五好友，一起看电影；渔民海员好不容易上岸休息，陪家人看个电影；客人来了，要不请看电影好了；羞于向心仪的人表白，那委婉点，先从约看电影开始吧；正式谈恋爱就更不用说了，不看上十来场都显得不够甜蜜不够有诚意……

影剧院的繁荣让很多人看到了商机，周边开起了各种店，形成了一个以影剧院为中心的小商圈。有个别脑子活络的，在边上随便支个小摊，生意居然不错。这下好了，引得一些原本沿街叫卖的摊贩也不甘落后，纷纷赶了过去。麦芽糖、炒瓜子、炒花生、糕点面包、爆米花、水果等美食摊位是主力军，若是夏夜，当然还会有卖冰棍、雪糕和冰莲羹的，此外，还有修鞋补鞋的，卖玩具和生活用品的……

母亲也动了心思。父亲是海员，具备在外采购的便利，那些年，父亲运过白菜、螺蛳、芋头、莴笋等到岛上，而后跟母亲一起去菜市场贩卖。那些东西，要么是岛上稀缺的，要么进价低廉，总之，须得有赚头。

去影剧院那里卖什么好呢？不能任由自己选，得看父亲能采购到什么合适的。也亏得父亲活络，找到了金橘和柿饼。当时，岛上还没有柿饼这种食品，它那么甜糯可口，我跟弟弟吃了还想吃，被母亲拦下，她把装柿饼的大塑料袋用布条紧紧扎起来，而后，拍拍塑料袋，把我们搂了过去，说等赚了钱，让父亲专门买来

给我们吃。

木头手推车派上了用场，一大袋柿饼，一竹筐金橘，还有一杆秤和一把小凳子，装于其上，母亲头戴新毛巾，握住手推车的两个手把，向影剧院进发。在那块空地的小摊圈里，母亲属于后来者，她有点难为情地挤了过去，推着车，小心翼翼地挪动，生怕碰到别人，然后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停下。那里的摊位是不固定的，谁早到谁占，但好多次，母亲就算去得早，也依然老老实实地守在边角角落。她说，抢占好位置，搞不好会成为众人眼中钉的，就是做点生意，伤了和气就不值当了。

影剧院里，上演着各种爱恨情仇悲欢离合，影剧院的台阶下，是真实人间的一角，每一张脸多多少少透露了其生命的本相，平静，沧桑，热忱，悲苦，从容，隐忍，坚韧……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贩中，有个补鞋的形影是显眼，棕黄色的围裙裹住了半个肥胖的他，围裙下露出的一条腿向外翻。且比另一条细小。他补鞋用劲时，小木凳偶尔会发出“吱扭”声，真担心会因承受不了他的体重而散架。男人是那里出勤率最高的一个，修鞋技术不错，积攒了一定的口碑。他的脸总是绷得紧紧的，仿佛面部表情一放开，皮肤会破裂一样。

母亲的摊位跟她的为人一样，不事张扬。也许是母亲长得漂亮又和善，也许是货品实在吸引人，反正，每天不至于空跑，总能卖出去一些。

有一次，老天突然变了脸，一场大雨下得猝不及防，各摊主如受惊的小动物，纷纷逃开了去。母亲推着这么一辆车，哪里跑得动，只得把备着的雨衣盖在货品上。柿饼虽有塑料袋装着，就怕万一出现破洞，水一渗进去就完了。母亲到家时，浑身湿透，走一步，水泥地上就出现一小滩水。她匆忙抹了把脸，揭掉雨衣，紧张地查看。挂了霜的柿饼一个个在塑料袋里躺着，像躲在帐篷里，很干燥，很安全。母亲这才长长吁了口气，去洗澡换衣了。

那场雨让母亲感冒了一场，她护下来的那些柿饼后来都卖光了。母亲也兑现了承诺，让父亲出海时特地买了柿饼，让我们姐弟俩吃了个够。而母亲，在影剧院存在于岛上的那些年里，从未想过要去看一场电影，电影票得花钱去买，她舍不得。尽管她曾离它那样近。

一瓶红钳蟹酱

回味

裴七曜

回乡小住。去海边走走，偶遇金女嫂。

金女嫂六十出头，身材瘦长，已有些许白发，但热情爽朗，气色很好。她的男人在海边养塘，金女嫂也常去帮忙，夫唱妇随，日子过得很滋润。

我看到塘边有几只长长的用细细的尼龙线编织的笼子，边上，眼睛像火柴棒一样的红钳蟹嘴里冒着泡，默不作声地爬来爬去。

金女嫂说：“红钳蟹碾蟹酱味道不错，如果你喜欢吃，哪天进笼多，我可以送到你大姐处，让她帮你碾一下。”

红钳蟹酱，那是窖藏在记忆深处一道妙不可言的佳肴，我肯定喜欢吃，但我有些不好意思。我说：“阿姨，如果你抓到的红钳蟹多，可以去市场上卖啊。”她笑嘻嘻地说，偶尔去卖过几次，但大多数送人了，有时抓到的红钳蟹不多，就直接喂鸭子了。

几天后，我回城。又过了几天，接到了大姐的来电。大姐说金女嫂送了不少红钳蟹过来，已碾好成酱，装瓶，哪天有空来乡下拿就可以了。拿到蟹酱后，我拧开瓶盖，闻到了一股久违而又熟悉的香味。我在白色的瓷碗里倒了一点，然后用筷子蘸了蘸，放在舌尖上，点点滴滴的往事在那一刻渲染成片……

曾记得，每当夏日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最大的乐趣是跟着父母去海边的滩涂上挖蟹。父母亲背着篓或提着水桶，确实是正儿八经地在挖红钳蟹。而我们，似乎不怎么喜欢挖蟹，我们只喜欢挖红钳蟹。因为它长得太小了，有的像大拇指，有的像小拇指，这要挖多久才能装满一篓或一桶。而且，红钳蟹如果清蒸或炒着吃，味道并不怎么样。

当我们在滩涂上玩耍奔跑的时候，最大的梦想是挖青蟹，尤其是“对蟹”（指两只生活在一起的青蟹，一公一母，体型特大），谁何到了，宛如考上了状元，沾沾自喜。没有小伙伴愿意去挖红钳蟹，除非那天出门连一只青蟹也没有抓到，只好垂头丧气地抱几只红钳蟹装模作样地回家。总不能空手而归吧。

在十六铺，寻觅老辈宁波人的足迹



小东门“童涵春堂”旧址



方浜中路“协大祥”

有多少宁波人，踏上十六铺融入上海滩。

十六铺地处东门路，我们习惯叫小东门。小东门附近有方浜东路，隔一条人民路，即是方浜中路，朝西走，是沪上著名旅游地豫园。在上海，大多数人还是叫它“老城隍庙”，今五香豆的包装上仍沿用老名称，为“老城隍庙五香豆”。我儿时读书在老城隍庙旁的昼锦路小学，班上有一半同学是宁波籍的，他们多住在靠近十六铺的丹凤路、梧桐路、新开河那里。我后来在镇海工作，单位里不少同事的亲友就住在小东门周围，说从前过年时去上海，住在亲戚家里，睡在阁楼、地板上，亲情却是深厚的。

十六铺近旁有咸瓜街，亦不容小觑。多年前去东方明珠塔，底层设有上海城市历史博物馆，其中有一条仿照清末的布景小巷，巷口站着一位穿马褂的长者，墙上挂着纸灯，灯上书“咸瓜街”。曾读过胡祥翰的《上海小志》，写的是百余年前的情景，其中提到“北四川路、武昌路、天潼路等，如在广东；小东门洋行街多闽人行号，如在福建；南市内外咸瓜尽甬人商行，如在宁波。”胡祥翰是胡适族叔，该小志序言由胡适先生所撰。咸瓜街

分内外两条，书中因此称“内外咸瓜”。沧海桑田，如今咸瓜街那里已是高楼林立，而百余年前宁波人在这里聚集发迹，亦有说不尽的话题。相传“咸瓜”是“咸鱼”的别称，如探究起来，也是蛮有趣的。

不妨重新来端详一下历史上的十六铺。这地名是清代定的，当时上海城厢划为二十七“铺”，“铺”相当于现在的街道联防。“十六铺”是最大的“铺”，管辖的正是上海的各种码头尤其是客运码头集中的地方，出入旅客甚多，所以，十六铺成了名气最大的“铺”。1842年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，外商投资开办的航运企业相继出现。1862年，美商旗昌洋行开办轮船公司，在十六铺建立第一个轮船码头，旧称“金源利码头”，就是后来的十六铺客运码头。

早在开埠之前的1819年，宁波旅沪船商在十六铺近旁的蔑竹街荷花池那里建造了浙宁会馆。我小时候见过那里的旧址建筑。在当时的沙船业中，宁波人李氏镇康新记为巨擘，拥有船只最多。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说法，上海钱庄发源于十六铺一带，而钱庄的发展与豆类业、沙船业的关系甚为密切。如镇海方家，早在清嘉庆年间，就开始经营粮食。后来，又发展到去上海从事食糖、土布等贩运、买卖，并自造夹板船运输经营货物。为了调度和融通资金方便，到了方家第二代，由方性斋于1830年在上海南市开设履和钱庄。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还有镇海李家，其祖先李也亭于1822年来到上海，先在十六铺附近的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当学徒。他每天送热酒到停泊在大码头的沙船上，船上的老大和生意人见他勤恳老实，就劝他到沙船上去做事。李也亭上船后一面做工，一面用少量本钱带货，继而又由带货发展到投资，积资渐多，遂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字号，买下久大码头，又自行在十六铺里街开设立余钱庄。

记得余秋雨先生在《金钟楼记》一文中说过：现代都市最大的遗憾，是缺少故事和传说，所有的房屋、街道、车流、人群太实际，缺少一些遐想的烟雾、浪漫云气。不过细细说来，上海还是有一些故事的。

宁波商帮的全方位成功，与他们良好的素质大有关系。历史一页页翻回到20世纪20年代，宁波人经营的小东门“协大祥”布店，对待顾客，无论贫富，一视同仁。有一次，一位农民模样的人，腋下夹了一双布鞋，在店门口徘徊。经理孙琢璋见状上前询问，方知该顾客因两腿满是污泥，恐玷污店堂，不免踌躇。孙经理当即唤学徒打一盆清水给顾客洗脚。顾客洗净后，穿好布鞋，连声称谢，随后安然选购。

早先“协大祥”布店在方浜东路口，店堂很深，儿时经常跟了大人到那里买东西。“协大祥”包布的纸张很大，画有店家门面全图。30多年前，“协大祥”迁至方浜中路，每次回沪总要去看看。进门左手边，摆放着陈列柜，展示当年的店规及店员证书。老城厢改建后，店已关闭，但门面尚在。近日经过，留了个影。

与“协大祥”一街之隔的“童涵春堂”，距今已有230多年的历史，创始者为宁波人童善长。当年童氏一面经营药材，一面在上海开设元亨木行，自备元、亨、利、贞号四大大型帆船，经常往返于上海至北方及南洋群岛。当年有口皆碑的“童薄片”炮制技艺，是将蚕豆大小的半夏，切成100多片平坦不翘的薄片。如将报纸置于薄片下，文字清晰可见。“童涵春堂”国药号饮片、药酒及夏令痧药等，通过水手带到南洋群岛，逐渐有了名气，后来产品在东南亚诸国销路广阔。“童涵春堂”风风雨雨走过了两个多世纪，拥有多家分号，上海老城隍庙内的“童涵春堂”，较为出名。原来的药局老建筑至今仍屹立在原址——十六铺。

屋檐是故乡的眉

乡愁

寒石/文 顾玮/摄

现在的房子，长得越来越细溜高耸，像一棵棵无枝无蔓的树，暴雨骤来或者酷暑炙烤的日子，头顶上独缺一披可以遮阴避雨的屋檐。阳光和雨以同样的直白方式泼洒下来，行人无处躲藏。风的影响要小些，只是没有屋檐的庇护，风的坚硬、泼辣，一如风的张扬、无羁。

从前的房子都是有屋檐的，老底子民宅屋檐的功能肉眼可见。我家的老房子，上屋檐窄窄如带，一米左右，基本功能是保护板壁，免遭风雨阳光侵袭。下屋檐宽绰多了，几乎就是一个正房的空间。屋柱与横梁组合，整排的木椽子把檐头挑出来，下面就是半遮阴的活动场地。屋檐下，泊着农家一个个咸淡自如、风轻云淡的日子。

印象里，老爸、老妈一直在宽敞的屋檐下忙碌：晾晒、洒扫、打盹，或者把竹椅、晾架、花盆之类从屋檐东首搬到西首，又从西首搬到东首……有些时节，屋檐下堆放的刚打的柴草、稻草、芝麻秸、毛豆秆之类。屋檐下堆积着他们一生都忙不完的活计。老爸走后，老妈坚守着这样的日子，累了，就着竹椅歇会儿，喝口茶，乘凉或晒晒太阳，陪伴她的是屋檐下唾手可得的锄、锨、扁担、扫帚、土箕等农具家什。很难想象，没有屋檐，她老人家生活是什么模样。

屋檐下有人间特有的温度和气息。在乡间，屋檐是各家各户一个非正式的对交流平台。孩子们在屋檐下追逐、打闹、过家家。农闲时节，女人们在屋檐下架起席机做席，两两搭档，一个起草一个把扣，配合默契；男人们在一边脱草壳、搓麻筋，或喝茶、侃大山。屋檐既能遮风避

雨、避免烈日炙烤，又能提供相对开阔的空间和必要的光线。谁家遇红白喜事，相邻人家的屋檐下就成了宴席厅，一桌桌摆开，全村人聚在一起，喝酒，行令，热闹非凡。

大哥找对象时，陆续说了几个，没成。后来又遇到一个，是邻村的，上门一说，成了。原来



▲中式屋檐与花树构成灵动之美。

◀两层屋檐的乡间民居。

姑娘（后来的大嫂）读初中时，有次放学突遇大雨，在我家屋檐下躲雨。老妈见小姑娘淋得一身湿，把她让进屋里，拿来干毛巾帮她擦头发、擦衣服，还把书包擦干，又冲了杯红糖姜茶，看着她喝下去……嫂子后来谈，当她得知男方是自己曾经躲过雨的那户人家的儿子时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“这样的人家不嫁，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”

“拂水竟何忙，傍檐如有意。翻风去每远，带雨归偏驶。令君裁杏梁，更欲年年去。”这是唐代皇甫冉的《赋得檐燕》诗。一对燕子落巢在一户人家屋檐下，衔泥筑巢，捉虫育雏；风雨里，穿梭忙碌；日滋月长，竟有些流连忘返，想年年归巢这户人家屋檐下。这样的情景剧在老家屋檐下年年上演。燕子是家鸟，是认家的。每年开春，我家那两对家

燕总是约好了似的，双双对对，相隔几天回到我家屋檐下，在板壁上筑巢，燕语呢喃，养儿育女。这在乡村被视为祥瑞。那些日子，劳作之余，老爸老妈又多了项活计，时不时持根竹竿坐屋檐下，守着两窝燕子，以防邻家那馋嘴的虎头猫和其他路过的野猫在屋梁上出没，打两窝家燕的歪主意。没事时，他们也要求我们哥儿几个这样做。我们坐在屋檐下，看燕子垒巢、孵蛋、喂食，看着黄口雏儿一天天吵吵嚷嚷，慢慢长大。这是一个乡村孩子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早启蒙。

等两窝雏燕羽翼渐丰、振翅学飞时，又到离别时候了。燕子辞别，跟归来一样，从不跟人打招呼。忽然某天，屋檐下没有了叽叽喳喳声，没有了在岁月光影里飘忽翻飞的剪影。燕去巢还在。

小时候，我对燕子的生活习性特别不理解，觉得它们完全可以常年在我家屋檐下住下来，大可不必风风雨雨地来回折腾。老妈说了句我当时不太懂的话：“燕子长着翅膀呢！小燕子翅膀长硬了，就得去外面闯荡；可是外面再好，飞得再远，它们也记得回家！咱家屋檐下是它们永远的家。”成年后，我才略懂得此中深意。是的，燕子有家，它们一旦选择在哪户人家、哪片屋檐下安居，此处就是它们永远的家。

屋檐是长在故乡脸上的一道眉。长大了离开家乡，在城市漂泊，在城里安家，累了倦了还是要回老家，住在带屋檐的老屋里。屋檐是我乡愁的一部分，也是我灵魂的皈依处。

当我老了，我想也会回到老家宽宽的屋檐下，跟老爸老妈一样，喝茶，聊天，看雨，晒太阳。